

人生小语

丁聪大师为文化人造像，贱名亦忝列其间。像后例有自述及友朋附语。我的自述是：“吃麦当劳，喜欢柳如是，研究中国文化。”季羨林先生赐语曰：“相互切磋琢磨，莫忘那更好的一半。”王蒙撰一联：“古今商之，阅经史子集，颇悟微言妙谛；天下念也，观暑寒晴雨，但求大概明白。”内子陈祖芬附语：“小孩总想装大人。”丁聪夫人沈竣赐函或打电话，呼我为“民国前”。本所一副所长荣升，临别语所内同人：“刘先生即之也温，久而知其严，再久，又转温矣。”二十余年前，一职掌文化界之高官评云：“自傲之甚，天下谁都不如他。”邻居一退休女杂技演员的印象：“刘老师就是胆儿小。”

2002年3月1日

载香港《明报月刊》2002年5月号

庄子与现代和后现代

庄子其人其书其学，在中国思想史、学术史、文学史上是一个极特殊的景观，甚至可以说是个异数。抉发人心世道的说理文章，文辞竟然这样优美，想像力如此丰富，意象这般瑰丽，先秦诸子中，找不到第二家。也许只有屈原的《离骚》差可比并，但《离骚》是韵文，《庄子》是散文 文体不同。鲁迅称《史记》为“无韵之《离骚》”，《庄子》应该是真正的无韵之《离骚》。恰好庄子和屈原都是楚人，庄、骚的华丽繁复的文体，反映出我国古代长江文化区域和黄河文化区域不同的文化色调。

中国传统学问讲求考据、义理、词章，庄子已开学人词章优美的先河。史学家陈寅恪论《再生缘》的文体曾说：“无自由之思想，则无优美之文学。”此论用来解庄，恰切至极。庄子词章之美，来源于思想的自由。庄子所追求的是自由无碍、自然无恃的人生境界。“其寐也魂交 其觉也形开 与接为构 日以心斗”（《齐物论》），这种烦恼人生，庄子最不能接受。“终身役役，而不见其成功；蓊蓊然疲役 而不知其所归”（《齐物论》）这种不能自主的被动人生，也为庄子所厌弃。他把因不能自由生活所引起的种种人生困境，给

陈寅恪论《再生缘》的文体：“无自由之思想，则无优美之文学。”

定一个名称,叫做“天刑”。他的正面主张是“乘物以游心”(《人间世》),即顺应自然律,保持心灵的自由。这种境界的最高表现,是“无己”“无功”“无名”(《逍遥游》)。但“三无”之中,“无己”最重要,所以庄子又称“无己”为“吾丧我”(《齐物论》)而做到这一点,也就解决了人生的最大最后一个问题——生死问题。“大块载我以形,劳我以生,佚我以老,息我以死。故善我生者,乃所以善我死也”(《大宗师》);“上与造物者游,而下与外生死、无始终者为友”(《天下篇》)从而进入庄子的最高人生理想境界——“至人”的境界。

孔子解决的是“人人”的问题,老子解决的是“天人”的问题;庄子解决的是“人我”问题。

庄子和老子都是道家的代表人物。但我的看法,庄子并不是老子衣钵的承继者,而是另辟天地,自立宗旨,于道家的哲学有独立建树。老子和庄子,都是道家的创辟人物,他们企图解决的宇宙人生的根本问题互有不同。老子解决的是“天人”问题,庄子解决的是“人我”问题,而孔子,则解决的是“人人”问题。“人人”关系,受制于社会变迁,所以儒学多变,大家知道的,儒学有三期或四期之分,也许四期的说法,更有道理。汉代的董仲舒倡“天人合一”之说,是不是也含有弥补先秦儒学主要解决“人人”问题而忽略“天人”问题的不足之处?

儒家当然也讲天,但孔子讲的天,有一个模模糊糊的人格神在,不纯是自然之天;庄子之天,则纯乎自然之天。道,孔子、老子、庄子都讲,但孔子重人道,名言是“天道远,人道迩”;老、庄重天道。老、庄的道,也有区别。老之道,很有点像黑格尔的“绝对精神”;庄之道,则像康德的“自在之物”。道是高度抽象的绝对,无论康德、黑格尔、老子、庄子,都是如此。但康德、黑格尔的绝

对是死的，老、庄的绝对是活的。老子的命题：“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”如果这一命题停留在“天法道”的阶段，就和黑格尔的“绝对精神”或者康德的“自在之物”没有区别，但后面还有“道法自然”一句。庄、老之道，因自然而活，因自然而获得生命。

庄、老之道 因自然而活，因自然而获得生命。

庄学本乎自然，其学说建立在大千世界千变万化的基础上，不求永恒，只述相对，反而使自己的哲学意涵具恒在意义。儒家一意求永恒，守“天不变，道亦不变”的律条，反而常常发生危机。最大的危机在晚清。危机之根源，在儒学的依托物是社会的经济与政治结构。老之学是超离于社会的经济政治结构之上的绝对律令，无需随社会结构的变化而变化。庄之学不仅超离社会，还超离个人，因此也无需随时趋变。儒学在诠释中获得生命。老学和庄学不必诠释就可以流传。晚清以还社会结构的变化，造成传统儒学价值的崩塌，以传薪续命为己任的新儒家，故有“花果飘零”之叹。

而传统儒学与东亚的经济起飞是否有直接或间接的互动关系？或者说，中国的儒家传统与现代性是否相关？这类话题正在为许多学者所关注并因此而争论不休的时候，庄子哲学已经为现代人迷惑缠陷、为外物所困的遭受“天刑”的处境，提供精神解脱的普遍性资源了。西方思想界近年极重视老庄学说，原因就在于此。人们越来越认识到，老子是超越一切东儒西哲、往圣今贤的人类最高智能的结晶，老子哲学是不受时空限制的哲学的哲学。在现代和后现代社会，政治将不再主宰一切，权力也不能决定一切。知识，世俗化了；知识分子，边缘化了。人类向往个体自由的精神，需要庄子哲学来点燃并打开自蔽的牢笼。庄子主张个体精神自由，并不伤害社

老子是超越一切东儒西哲、往圣今贤的人类最高智能的结晶，老子哲学是不受时空限制的哲学的哲学。

会；老子冀图权力者学会“治大国，若烹小鲜”的本领，减少政治动荡，尽量保持社会的完型。如果说儒家是维护社会的整体秩序，道家则是希望保护个体生命良性运动的自由秩序。

中国学术不能无孔子、孟子，也不能无老子、庄子；中国文化不能无儒家、释家，也不能无道家。

庄子所追求的这种个体生命的自由，见诸生活，是一种享受；诉诸人生，则是一种审美。中国学术，不能无孔子、孟子，也不能无老子、庄子；中国文化，不能无儒家、释家，也不能无道家。我个人不赞成传统文化的儒家中心说，但并不低估儒家的思想的、哲学的、政治的历史作用。中国历史上，儒学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占统治地位的学说。儒学弘明正大，但宋学的理性之美，同样令人爱慕。释家和道家，特别是道家思想，其对社会、对个人的影响绝不可低估。儒释道三家、三派、三教的相拒相融，互动互补，是中国传统思想与文化的特殊存在状态。我们固然应该从社会结构中去寻找思想形态的归根结底的原因，同样，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与经济结构的变迁，也可以从儒、释、道三家的互补互动中得到可靠的消息。我因为研究学术史，所以格外喜欢庄子的《天下篇》。“天下大乱，圣贤不明，道德不一，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。比如耳目鼻口，皆有所明，不能相通。犹百家众技也，皆有所长，时有所用”。其述晚周百家之学，明通如此。我倾向于认为《天下篇》是《庄子》“内篇”的后序，因此也有可能出自庄周自己的手笔。

儒释道三家、三派、三教的相拒相融，互动互补，是中国传统思想与文化的特殊存在状态。

[载2001年1月17日《中华读书报》]

传统与记忆

我有时想，人类实在是太傲慢了，要征服自然，要排压另类，要改变别人，要篡改历史。当然人类这种精灵是绝顶聪明的，不会承认自己时时在篡改历史。我们只好换一个说法，提出人类真的知道自己的历史吗？或者说已经成为历史的物事人们还可以真实无误地复制出来么？不同民族的生活之链是可以结成各自的传统的，但人类首先有忘记自己历史的传统。

然而忘记是人类的生理保健机制。

《列子》里讲过一个故事，说宋国有一个叫华子的人，正值中年，得了一种忘病：“朝取而夕忘，夕与而朝忘；在途则忘行，在室则忘坐；今不识先，后不识今。”全家人被他烦扰得苦不堪言，四处求医，均不见效。后来鲁国一个儒生给他医好了病。然而如梦方醒的华子勃然大怒，又打孩子，又骂老婆，又赶儒生，说道：“曩吾忘也，荡荡然不觉天地之有无，今顿识，既往数十年来，存亡得失哀乐好恶，扰扰万绪起矣。吾恐将来之存亡得失哀乐好恶之乱吾心如此也。须臾之忘，可复得乎？”钱锺书先生《管锥编》卷论《列子》张湛注，在引据了这则故事之后，连类取比，又征

忘记是人类的生理保健机制。

引西籍之相关者比较为说。一是古罗马诗人霍拉斯写一个患狂疾的人，此人坐在家里而生幻觉，能凭空看到男女角色在眼前搬演剧本，不禁击节叹赏。经良医治愈，他反而怨怼。“诸君非救我，乃杀我也。”因为好戏不能再如此便宜地看到了。另一个是意大利近代一位诗人笔下的狂症病号，忽然自称登上了国王宝座，颐指气使，志得意满，友人延医疗救，方得恢复神志，知道自己不过是普通公民。但颇恨恨，哭着埋怨疗救者：“尔曹杀我，昔者迷妄，而吾之大乐存焉，今已矣。”钱锺书先生说：“西洋诗文每写盲人一旦眸子清朗，始见所娶妇奇丑，或忽睹爱妾与忠仆狎喋等事，懊恼欲绝，反愿长瞽不明，免乱心曲，其病眼之翳障不啻为其乐趣之保障焉。盖与病忘、病狂，讽论同归。”这也就是何以并且也难怪人类会有忘记自己历史的传统。

由此愈发可见以探究历史真谛为职志的学人之所为作，是何等地异乎世人而不懂生理保健，以及克服人类本身与生俱来的“病眼之翳障”该有多么地困难重重。笔者近年的研究更多地倾向于传统一方面，特别是晚清以还的中国现代学术传统和思想传统，引发我甚大的兴趣。但我之所作，不过是智力识力所及的整理资料和试图在学理上恢复记忆而已。《传统的误读》这个书名所标示的意涵更适合我自己为学的情形，说开来，主要是出于个人对历史的特殊癖好。我曾说：“对于历史，我们能够说什么呢？离开历史，我们又有什么好说呢？”

1996年2月10日于中国文化研究所

〔此为拙著《传统的误读》后记 载 1997年第1期《读书》杂志〕

王国维的诸种矛盾和最后归宿

我所说的最后归宿，是指 1927 年的 6 月 2 日，王国维在颐和园的鱼藻轩前面跳水自杀了，死的时候才 51 岁。他生在 1877 年，死的时候是 1927 年，整 51 岁，正当他的学术盛年。中国最了不起的学者，他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导师，而且曾经是溥仪皇帝的老师，是全世界闻名的大学问家，突然跳水自杀了。这个事件当时震惊了全国，也可以说震动了全世界。一百年来，对于王国维为什么要死，到现在也不能说是解决了，仍然是学术界一个大家饶有兴趣探讨的学术之谜。

我这里不是专门研究他的死因，不想给这个问题作出一个最后的结论，只是想指出，王国维的一生，始终是一个矛盾交织的人物。主要讲讲他的精神世界和人生际遇的矛盾。我把他一生的矛盾概括为十个方面，这个别人没有这样讲过。

1 个人和家庭的矛盾

王家的先世最早是河南人，在宋代的时候官做得很大，曾经封

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是海宁人，明代史学家谈迁是海宁人，武侠小说家金庸也是海宁人。

过郡王。后来赐第浙江海宁盐官镇，便成为海宁人。但宋以后他的家世逐渐萧条，变成一个很普通的农商家。到他父亲的时候，家境已经很不好。他的父亲叫王乃誉，有点文化修养，作生意之余，喜欢篆刻书画，还曾到江苏溧阳县给一个县官做过幕僚。喜欢游历，走过很多地方，收藏许多金石书画。王国维出生那一年，王乃誉已经 30 岁了。浙江海宁盐官镇是王国维出生的地方。这块土地人才辈出，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是海宁人，明代史学家谈迁是海宁人，武侠小说家金庸也是海宁人。王国维对自己的家乡很自豪，写诗说：“我本江南人，能说江南美。”

但王国维四岁的时候，母亲就去世了，由祖姑母抚养他。从小失去母爱的孩子，其心理情境可以想见。有记载说，王国维从小就性格忧郁，经常郁郁寡欢。不久父亲续娶，而后母又是一个比较厉害的人，王国维的处境更加可怜。他十几岁的时候，有时跟一些少年朋友聚会，到吃中饭时一定离去，不敢在外面耽搁，怕继母不高兴他。这种家庭环境对一个孩子、一个少年儿童影响是很大的，可以影响到他的一生。所以我说这是一重矛盾，即个人和家庭的矛盾。

2 拓展学问新天地和经济不资的矛盾

晚清的风气，特别是 1895 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以后，中国掀起了变革现状的热潮，所有富家子弟，只要有条件的都想出国留学。王国维家境贫寒，没有这个条件，他因此自己非常焦急，父亲也替他着急，但没有办法。17 岁的时候，他也曾应过乡试，但不终场而归。20 岁结婚，夫人是海宁同乡春富庵镇莫家的女儿，莫家

是商人家庭。他的婚姻，依我看未必幸福。想提升学问，没有机会；想出国留学，却得不到经济支持。这是影响王国维人生经历的一个很大的矛盾。

3 精神和肉体的矛盾

王国维小的时候，身体很瘦弱，精神非常忧郁，这跟继母有很大关系，也和父亲的不理解有关系。父亲王乃誉对他的要求是严格的，日记里对儿子的成长作了很好的设计，但不理解儿子的心理和学问志向。而王国维的思想非常敏感，从小就是一个智能很发达的人。一个很瘦弱的身体，你看王国维的照片，就可以看出来，却智能超常。所以他在《静安文集》的第二篇序言里讲：“体素羸弱，性复忧郁，人生之问题，日往复于吾前。”已经说得再明白不过，这就是他年轻时候性格的特点，这特点延续了他的一生。这就是我所说的一个人的精神和肉体的矛盾。

4 追求学术独立和经济上不得不依附于他人的矛盾

这也是伴随他一生的矛盾。王国维一生中有一个大的际遇，也是伴随他一生的问题，甚至构成他一生的死因，就是他和罗振玉的关系。王国维自己家里贫穷，不能到国外游学；应试，屡考不中；当过塾师，但很快就辞职了。直到 22 岁的时候 才有一个机会 到上海《时务报》做一份临时工作。《时务报》是汪康年所办，主笔是梁启超，章太炎也在《时务报》工作过。这是当时维新人士的一

王国维一生中有一个大的际遇，也是伴随他一生的问题，甚至构成他一生的死因，就是他和罗振玉的关系。

份报纸，在全国有很大影响。不过王国维参加《时务报》工作的时候，梁启超已经到了湖南，应陈宝箴、陈三立父子之约，主讲时务学堂。

王国维在《时务报》做书记，一些抄抄写写的秘书之类的工作。他海宁的一位同乡在《时务报》工作，因为家里有事，回海宁处理家事，让他临时代理。一个大学者做如此简单的工作，未免屈才。但他很勤奋，做了一段时间之后，恰好当时上海有一个专门学习日文的东文学社，是罗振玉办的，他就利用业余时间去那里学习日文，在那里认识了罗振玉。认识的机缘，是罗振玉看到王国维给一个同学写的扇面，上面有咏史诗一首：“西域纵横尽百城，张陈远略逊甘英。千秋壮观君知否？黑海东头望大秦。”王国维的《咏史诗》共二十首，罗振玉看到的是第十二首，看后大为赞赏，非常欣赏作者的才华。尽管王国维因为经济困难和其他诸多事情所累，学得并不是太好，罗振玉仍给予经济上的支持，使其无后顾之忧。后来又把王国维送到日本去学习，从日本回来后，罗振玉凡是要举办什么事业，都邀请王国维一起参与。罗王的友谊、特殊关系，就这样结成了。再后来他们还结成了儿女亲家，罗振玉的女儿嫁给了王国维的儿子。王国维一生始终都没有钱，罗振玉不断用钱来支持他。得到别人金钱的资助，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？一次我在北大讲这个题目，一个学生提问题时说，他觉得是好事，并说如果他遇到这种情况，一定非常高兴，只是可惜自己没有遇到。这当然也是一种看法。但王国维不这样看，他一方面心存感激，另一方面，也是一种压力，因为王国维是追求学术独立的学者。这不能不是一个极大的矛盾，即追求学术独立和经济上不得不依附于他人的矛盾。

王国维咏史诗：“西域纵横尽百城，张陈远略逊甘英。千秋壮观君知否？黑海东头望大秦。”

5 “知力”与“情感”的矛盾

王国维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，他的理性的能力特别发达，情感也非常深挚。

他能写诗，能写很好的词，同时在理论上、学术上有那么多的贡献。一个人的知力、理性思维不发达，不可能有那么多的学术成就，既研究西方哲人的著作，又考证殷周古史。而没有深挚的情感，他也不能写出那么多优美的诗词。本来这两者应该是统一的，但从另一个侧面看，他们也是一对矛盾。他自己说：“余之性质，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，而知力苦寡；欲为诗人，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。”那么到底是从事诗歌创作呢还是研究哲学，还是在二者之间。他感到了矛盾。当然从我们后人的眼光看，也许觉得正是因为他感情多，知力也多，所以才成就了一代大学人、大诗人。但在王国维自己，却觉得是一个矛盾。

王国维：“余之性质，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，而知力苦寡；欲为诗人，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。”

6 学问上的可信和可爱的矛盾

这个怎么讲呢？因为他喜欢哲学，喜欢康德，喜欢黑格尔，喜欢叔本华，喜欢他们的哲学。但他在研究多了以后，发现一个问题，就是哲学学说大都可爱者，不一定可信，可信者不一定可爱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哲学上其实有两种理论范型，一种是纯粹形而上的理论，或者如美学上的纯美学，这样的理论是非常可爱的，为王国维所苦嗜。但这种纯理论、纯美学，太悠远、太玄虚，不一定可信。而另一种范型，如哲学上的实证论、美学的经验论等，则是可信的，

可是王国维又感到不够可爱。于是构成了学者体验学术的心理矛盾。这种情况，在常人是不可能的，但一个深邃敏锐的哲人、思想家，会产生这种体验。

7 新学与旧学的矛盾

王国维一开始是完全接受新学的，研究西方哲学，研究西方美学，如我刚才所说，他曾经把这些学问向中国的学术界做了大量的介绍。但是后来，在 1912 年移居日本以后，他的学问的路向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。大家知道，1911 年辛亥革命成功，皇帝没有了，而罗振玉是不赞成辛亥革命的，是比较赞成清朝原来的体制的 因此辛亥发生的当年冬月 罗振玉就带着家属 也带着王国维，一起到日本去了。他们住在日本京都郊外的一个地方，后来罗振玉自己还修建了新居 把所藏图书搬到新居里 取名为“大云书库”。罗的特点是藏书多，特别对甲骨文、古器物的拓片和敦煌文书的收藏，相当丰富，据称有五十万卷。他们在那里住了几乎十年。王国维 1916 年先回国，住到上海，但有时候还要去日本。

在时代大变迁时期，知识分子如果不想趋新，只好在学问上面往深里走，就容易进入到中国古典的学问当中去，在个人也是一种寄托的方式。

就是在日本这六七年的时间里，王国维的学术路向发生了极大的变化。罗丰富的收藏，成了王国维学问资料的源泉，他在“大云书库”读了大量的书，就进入到中国古代的学问中去了。罗振玉也跟他讲，说现在的世界异说纷呈，文化传统已经快没有了，做不了什么事情，只有返回到中国的古代经典，才是出路。在时代大变迁时期，知识分子如果不想趋新，只好在学问上面往深里走，就容易进入到中国古典的学问当中去，在个人也是一种寄

托的方式。我想王国维内心就是这样，所以听了他的话，学问上发生了大的变化。他所以成为后来非常了不起的学者，跟这六七年的钻研有极大关系。他早期介绍西方哲学美学思想的那些文章，都收在《静安文集》和《静安文集续编》两本书中。有一个说法，说王国维去日本时，带去了一百多册《静安文集》，听了罗振玉的话后，全部烧掉了。研究王国维的人有的认为他不大可能烧掉，说这是罗振玉造的谣。

据我看来，烧掉《静安文集》是完全可能的。一个人的学问总是在不断变化，到日本之前，王国维的学问已经变化了一次，由研究西方美学哲学，变为研究中国的戏曲文学，写了有名的《宋元戏曲史》。我个人是念文学出身，但后来喜欢思想学术与历史，喜欢历史以后几乎完全抛开文学。我就有这样的体会：觉得过去写的文学方面的书和文章一无所取，有时甚至从内心里产生一种厌恶，烧虽然没有烧，但早已放到谁也看不见的去处了。这也不是对文学的偏见，也包括随着年龄学问的增长，喜欢求历史的本真，而不再喜欢文学的“浅斟慢饮”，觉得不能满足自己的寄托。当然年龄再大些，学问体验再深一步，又觉得文学可以补充历史的寻觅了。总之我相信王国维到了东京以后烧书，这个事是真实的。所以不妨看做他的新学和旧学是有矛盾的。前期是新学，后期又归于旧学。这个学术思想前后变迁的矛盾是很大的。

8 学术和政治的矛盾

本来他是一个纯学者，不参与政治的，但他有过一段特殊的经

历，是这段经历把他与现实政治搅到了一起。辛亥革命以后，他对新的国家制度采取不合作的态度，虽是一种政治选择，但没有很大关系，主要是后来他又当了溥仪的老师，就进到敏感的政治里面去了。辛亥革命后，1912年清帝逊位，但民国签了条约，采取优待清室的条件，仍准许溥仪住在紫禁城内，相关的礼仪也不变，用今天的话说，叫待遇不变，在紫禁城里照样过着皇帝的生活。大家一定看过溥仪的《我的前半生》，你看他在紫禁城里生活得多好，可以骑自行车，觉得紫禁城门槛不方便，就把皇宫里的门槛全都锯断了，为了好玩，就打一个电话给胡适什么的。那个时间很长，一直持续到1924年，冯玉祥才把他赶出宫。王国维当溥仪的老师，是1923年4月（农历三月）下的“诏旨”。年初（农历十二月）皇帝大婚，然后就“遴选海内硕学人值南书房”。王国维做事很认真，事情虽然不多，他愿意尽到自己的职责。1924年1月溥仪发谕旨，赐王国维在紫禁城骑马，王国维受宠若惊，认为是“异遇”。因此当溥仪被赶出宫时，王国维极为痛苦，对当时的社会现状充满了不满。而且在宫中遇到了诸多的人事纠葛，和罗振玉也有了矛盾。此时，他所心爱的学术和现实政治也产生了矛盾。虽然他是一个纯学者，但还是跟政治有了无法摆脱的关系，这就构成了他思想世界的另一个矛盾——学术和政治的矛盾。他的自杀，与这一重矛盾有直接的关系。

当溥仪被赶出宫时，王国维极为痛苦，对当时的社会现状充满了不满。

9 道德准则和社会变迁的矛盾

这一点很重要，任何一个人都不可避免的。当社会发生变迁的

时候，你是跟社会的变化采取相一致的态度，顺时而行，还是拒绝新的东西，守住以往的道德规范？这是一个蜕变的过程。有人比较顺利，社会往前走，他跟着往前走；但是也有一些人，他不愿意立即改变自己的准则，想看一看新东西是不是真好，或者压根就认为所谓的新东西其实并不好，也许并不是新东西，而是旧东西的新装扮。这一点，陈寅恪在《元白诗笺证稿》里，讲到元稹的时候，有专门论述。他说当社会变迁的时候，总是有两种不同的人，一种是趋时的幸运儿，一种是不合时宜的痛苦者。他的原话是这样说的：“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，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，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，而其贤者拙者，常感受苦痛，终于消灭而后已。其不肖者巧者，则多享受欢乐，往往富贵荣显，身泰名遂。”王国维就是那种“贤者拙者”。这一重矛盾在王国维身上非常突出，所以当辛亥革命之后，当溥仪被赶出宫以后，他非常痛苦，痛苦得想自杀。

当社会变迁的时候，总是有两种不同的人，一种是趋时的幸运儿，一种是不合时宜的痛苦者。

10 个体生命的矛盾

也就是生与死的矛盾。这在一般人身上不突出。一个普通人，年纪大了，最后生病了，死了。死了就死了。虽然每个人都难免留恋人生，但王国维采取了一个行动，在 51 岁的盛年，在他的学园的成熟期，居然自己来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这是很了不起的哲人之举。我说“了不起”，大家不要误会，以为我认为所有的自杀都是好的。过去在传统社会，有的弱女子，受不了公婆的气，投井自杀了，这类例子不少。但这是一种被迫的一念之下的情感发泄，不是